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马基雅维里主义

〔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马基雅维里主义

“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
现代史上的地位

〔德〕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著

时殷弘 译

商务印书馆

200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德)迈内克著；时殷弘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5504-8

I. 马… II. ①迈…②时… III. 马基雅维里, N. (1469~1527)—哲学思想 IV. B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 第 067034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马基雅维里主义

“国家理由”观念及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

〔德〕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著

时殷弘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5504-8

2008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8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9 1/8

印数 5 000 册

定价：36.00 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00 年已先后分九辑印行名著 360 余种。现继续编印第十辑。到 2004 年底出版至 40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03 年 10 月

目 录

英译本编者导言	1
导言	51

第一篇 幼年专制主义时代

第一章 马基雅维里	81
第二章 让蒂莱和博丹——马基雅维里在法国的最初反对者	112
第三章 博泰罗和博卡利尼	132
第四章 康帕内拉	164
第五章 “国家理由”观念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传播	200
第六章 黎塞留时期在法国的“国家最佳利益”观念	237
一 开端和 1624 年的《论君主和国家》	237
二 亨利·德·罗昂公爵	257
第七章 加布里埃尔·诺代	299

第二篇 成熟专制主义时代

第八章 略论格老秀斯、霍布斯和斯宾诺莎	313
第九章 普芬道夫	334
第十章 库尔蒂兹·德·桑德拉斯	359

2 目 录

第十一章	鲁塞	375
第十二章	弗雷德里克大王	394

第三篇 晚近德意志历史中的 马基雅维里主义、唯心主义和历史主义

第十三章	黑格尔	483
第十四章	费希特	517
第十五章	兰克	525
第十六章	特赖奇克	544
第十七章	过去和现在	567
人名索引		598

英译本编者导言

W. 斯塔克博士

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寿比人瑞。他 1862 年出生时,其德意志^{xi}祖国尚未实现长期追求的、在一个共同的德意志帝国内的统一(的确,行将确定这帝国的范围和政治特性的两大决定性战役——萨多瓦战役和色当战役——尚未进行),而当他于 92 年之后即 1954 年去世时,德意志帝国已走完了一整个生存怪圈。它在俾斯麦治下度过了短暂和辉煌的凌晨时光,在威廉二世治下经历了闷热浮躁的正午暑浪,接着熬过了战争和革命的磨难,步入阴影越拉越长的魏玛共和国午后,最后跌入专制暴政的黄昏,在 1945 年的决定性败北中被支解和翦除。迈内克目睹了所有这些事态发展,而这些事态发展也深刻地影响了他本人——不仅因为他是个优秀的德国人,而且更因为他是个优秀的历史学家。这虽然听起来似是而非,本质上确是朴素的实情。对迈内克来说,身为一名历史学家并不意味着活在往昔,或者思想情感眷恋往昔,而是首先意味着直截了当地投身于自己所处的那个时期的现实生活,感受其风云冲击,经受其暴雨洗礼。受到被称为“生活哲学”(Lebensphilosophie, 一个极难翻译出来的术语)的思想运动的深刻影响,并且靠近威廉·狄尔泰之类思想家,迈内克将历史研究更多地看作是整个人格的经验,即以设身处地似的理解来参与先前时期里人们的斗争,

2 英译本编者导言

体验其希望、恐惧、挫折和成就，而不那么是人类智力的操作。他确信，历史学家只有经由当今之门，才能进入往昔之地。这就是说，只有全心全意地进入当今现实，才能使他强烈地意识到什么真正重要，而这意识是在他试图把握往昔的现实时需要的。任何采取别种做法的人，任何以书蛀虫的心态习惯来查阅史料的人，都将无法同已逝年代里的活生生的力量建立起真正的联系，都将忽略现在和过去的极为本质的东西，而且确实将是一个处理僵死之物的无感觉的人。这样一种态度使学者肩负重担，承受一种极少有人喜欢承受的磨难。它将他推出平静的课堂和风雨不入的书斋，推到至少是政治行动舞台的边缘。迈内克一生都置身于这个舞台，从参与1908年的一项谴责威廉二世的动议，到深切同情1944年的反希特勒密谋。^① 他的著作中的精华，有许多正是出自这种与历史本身——实际发生的历史——的贴近。

在有些时期里，对于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整个这种态度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同情，而在另一些时期里，此种态度只是例外，一般饱受非难。在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较年轻时，它简直就是犯忌。19世纪末，德国历史学家们同其他学者一样，处在两大趋势影响之下：其一源于赫尔曼·科恩和保罗·瑙托尔普的新康德主义，其二是来自更为有力的西方实证主义，卡尔·兰普雷希特之类很有影响的人物便是它在德国的化身。尽管这些哲学彼此大不相同，也尽管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始终必定截然有别，但它们在有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都力图迫使历史研究者将他同史料的关系当

^① 《施特拉斯堡·弗赖堡·柏林》，1949年版，第124页往后；《德意志的灾难》，1946年版，第145页往后。

作一种明确的主体-客体关系。迈内克全不听从那一套。对他来说,历史学家的主要任务恰恰在于弥合旁观者与被旁观的生存之间的鸿沟,亦即克服别人认为是唯一“科学的”主体-客体关系。他并不认为历史学家对自己的研究领域能够或应当采取有如天文学家和植物学家那样的“客观”态度。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努力自我克制(实在是自我屈辱),以此尽量对自己研究的事实无所“动心”的历史学家,必定变成一位古物研究家,一位枯死事实的搜集者,好比历史的捡破烂人。他坦率地写道:“一种不带价值取向的历史编纂要么只是资料汇集和史学本身的预备,要么——倘若它自诩为名副其实的史学——给人枯燥无味的印象。”^①在其成名作《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的序言里,他如此表达了自己的信念:“本书基于这么一种观点:德国的历史研究必须再度升华为较少拘束的探讨,接触政治和文化生活的巨大活力,而不遗弃自己在治史方法上的可贵传统;它可以更大胆地进入哲学和政治,而不损害自己最深层的内在性质和目的。”^②这是一份宣战书,宣战对象是所有那些为数众多、认为史学无非是往事的精确写照和事件的单纯如实登 xiii 录的人们。对弗里德里希·迈内克来说,史学绝非如此。在他看来,它大可以说是一种深切的人类关怀,我们无法不变得在思想和情感两方面都介入其中。这再次有助于说明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他的书从来不是枯燥无味的。他向我们展示了生活,连同其所有令人大为痛苦的困难。历史在他眼里从来不像柔畅平静的稳流,而是始终变动不熄,永无确定,疑难丛生,危机不断。他治史的

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和价值”,《历史杂志》第137卷(1928年),第8页;重刊于《能动的明镜》,1948年版;参见第230页。

② 1922年版,第vi页。

特殊风格或许最鲜明地见于他的某些不大重要的著作,例如《德英同盟问题史(1890—1901)》。^① 在其中,英德两强之间谈判的史事更多地是从德国一边的外交家,而非超然和无所不知的旁观者的视角来考察。这样,读者就能够设身处地似地感受那相互斗争的意志间的张力,参与那正在围绕着柏林和伦敦的会议桌演出的冲突活剧。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迈内克不懂历史学术与政治时评的区别。他同样有自己的关于客观性和正直的理想,但它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理想,后者在他看来不过是呆板地仿造一种仅仅在自然科学中为人熟知的态度。对迈内克来说,客观不等于没有见解,一个活生生的人不可能没有见解,即使一个将自己变成了某种活的录音磁带的人有可能如此。客观意味着克服自己的片面性,控制自己的情感,变得甚至对敌人也公平合理。迈内克在这方面的努力很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虽然也许并未全盘成功,而这就是他吸引人的第三个原因。他一向坦陈直言,但从不轻率盲目。他从未使人当众受辱,从未向人讲道说教,但也从未造成一种印象,即所有人类行动都这样或那样地同等合理正当。

迈内克以一个短小精悍的说法,很好地抓住了他的这一治学理想的精髓。他说,历史学家应当是 *ein schaffender Spiegel*^② (一面能动的创造性的明镜)。实证主义和康德主义都要求历史学家充当一面没有生命、消极被动的镜子,毫不失真地反映它面对的形象。然而,只有自然现象才能以这一方式记录下来,人的奋争则

① 1927年在慕尼黑出版。

② 这是1948年出版的一部论文集的题目。

不能。人的奋争只会向有同情感的观察者展示其奥秘,这样的观察者既能观察,也能理解。迈内克的抱负就在于要使自己的历史学著作,连同所有历史学著作,成为在往昔造就的历史的某种再创造,而单纯的讲述历史不会使他满足。他同任何人一样明白此等努力永无可能完全成功,但他确信历史学作为一种人类研究,其价值取决于这努力成功的程度。如果说他盘旋于政治大锅边缘,在此过程中烧灼了自己的翅膀(希特勒当权时,迈内克蒙受了贬抑和耻辱),那么他这样做不是因为对政治竞技本身有兴趣,而只是因为他相信,参与现今事务能使他更好地将勃勃生气注入他对往昔事务的讨论,更好地使他的历史著作具备活力。诚然,他首先是一位历史学家,但他是一位特别的历史学家,特别就特别在他努力争取一种有想象力的、“历史探索与当代经验的协作”。^①

一种如此牢固地与同时代事态发展结合在一起的学识,不可避免地会在内容,特别是情绪气质方面受到时事起伏动荡的深刻影响,特别是因为迈内克在世的那 92 年充满着残酷无情、震撼世界的事件。有如一架地震仪,他的心灵登录了所有大大小小的震动,但有两大灾变在他的著作里留下了尤为深刻的烙印,那就是 1918 年和 1933 年的灾变。直到 1918 年为止,世界在迈内克看来有如一副愉悦的笑脸:他的早期著作被一种欢快的乐观主义感染,洋溢着热情和兴奋。说到底,这种得意感归因于 1871 年创立帝国 (*Reichsgründung*) 的经验,它像醉人的醇酒一般影响了整整一代德国人。一个产生了像俾斯麦的帝国那样辉煌成果的世界能有什么毛病? 1907 年首次出版的《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一书,带有一

① 《“国家理由”观念》,1925 年版,第 530 页。参见下面第 424 页。

种和谐、满足的哲学的印记。1918年以前的兴奋有多强烈，由这年的灾难招致的颓丧就有多严重。像这个时期里那么多其他德国人（例如马克斯·韦伯）一样，迈内克经历了一场精神危机。他从中解脱出来，怀着改变了的眼界和看法。在他看来，生活不再像圣诞老人，而像是互相敌对的势力争斗拼搏的战场。他在20年代的人生哲学是内在分裂和对立的，甚至可以把它说成是摩尼教式的。迈内克虽然仍渴求维持自己基本上是乐观主义的倾向，但越来越不得不承认历史中存在黑暗的、恶魔般的力量。强权与公理彼此间不再像它们在1907年时候那般被视作最终和谐的，而是不可更改地处于持久的殊死搏斗之中，没有原因，没有终结，也没有胜败。这十年里他的伟大著作——《现代史上的“国家理由”观念》是一部不愉快的书。不过，迈内克仍未触及谷底。1933年，事情有了新变化，即变得更糟。说它给迈内克带来了严重磨难也并不过分。他自认为是人道主义者洪堡、赫尔德和歌德的追随者，却发觉自己一头撞进了虐待狂希特勒、希姆莱和戈培尔的时代。他的著作在

xv 某种意义上变成了探寻他自己所称的 *Geschichtstrost*——“历史学家的慰藉”。难道对往昔的研究到头来不会发现某种征兆——不管它多么不确定——提示光明的力量并非总是注定要在同黑暗势力的争斗中失败？迈内克30年代的著作有一种悲苦意味。但尽管如此，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它被某种占据了迈内克内心的镇静所抵消。日渐垂老导致沉着和逆来顺受，但研读伟大的经典，尤其是歌德的经典也使得心绪更为平静，而我们的作者于1936年发表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历史主义》，正是以论说这位伟人结篇。迈内克苦思冥想，尝试摸索出一种关于现实的半宗教观念。第三帝国的崩溃使他能够摆脱被迫的退隐状态，这位八旬老翁

得以重新享有他年龄较轻时发挥的那种影响。当然，他无法向世界完完全全地展示事态的压力加之于他的那种新历史观，但《德意志的灾难》（1946年）之类著作和《兰克与布尔克哈特》（1947年）之类演讲向我们表明，他感到必须对传统的历史思想作何等深切的修正，他又是何等无畏地面对它那令人不安的挑战和它提出的难题。

—

有一项事实确保弗里德里希·迈内克的名字不仅在史学史上，也在更广泛的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那就是我们在他的思想发展历程中，可以观察到一种支配德国达100年以上的哲学传统的终结。他本人喜欢将这传统说成经典自由主义，威廉·狄尔泰则创造了“客观唯心主义”这一更鲜明、更适当的术语，并且在其中识别出了三大基本的和反复重现的哲学态度中间除唯物主义和“自由唯心主义”（idealism of freedom）以外的那一种。对客观唯心主义来说，世界不像唯物主义看来的那样没有意蕴，但也不像自由唯心主义主张的那样从外界、从一个使之成形的先验的神性获得其意蕴，而是载有这意蕴在其本身之中。它充满着一种世界灵魂，后者以它为化身，在其中将自身物化，使它的每个断片和微粒赋有价值。宇宙被设想为类同人体和人的灵魂。它首先是一个巨大的整体，甚至是一个有机体，其中每个肢体器官有自己适当的位置和功能。然而，它又不止是个有机体：正是这一点使此种哲学同某些唯物主义者的表面上类似的有机论区别开来；它无所不在，受一种精神原则激励，而这精神原则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 xvi

保证了它的和谐。这里的基调完全是乐观主义的：世界恰如——无论如何基本上有如——其应有状态。如果其中出现矛盾，它们就要么更多地是表面的而非真实的，因而能够被辩解过去；要么表现为臻于完美的和谐过程中的必然阶段，因而假以时日就会被生活本身克服。客观精神永不真正自相矛盾，正如我们自己永不真正自我搏斗。在此，泛神论一词或许能够被当作方便的标签，用来称呼整个这种快乐的态度。

当迈内克相信这种欢悦的哲学时，它早已经历了很长的形成过程，而这形成即使不完全是，也大体上只是个德意志现象。决定性地为其国家提供这种哲学的第一人，是18世纪初期的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他的关键概念——“既有和谐”(pre-established harmony) 虽然就其认定所有自然因素的协调归根结底来自全能创世主的神旨而言，一部分应归因于更早的一神论唯心主义，但已具有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特性，因为它将不断和谐化的法则认作在世界本身内现时起作用的，而不是从上面和外界不断突入的。此后，由于伟大的浪漫主义哲学家施莱尔马赫、谢林和黑格尔，人格化的一神论残余被成功地清除出去，最后剩下的是被称为“同一性哲学”(Identitätsphilosophie) 的首尾一贯的观念体系。它所以被称作“同一性哲学”，是因为它断言归根结底并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一切现象无论在平常生活中可以表现得如何对立(精神与物质、内容与形式、上帝与世界、我与你、实有与应有)，它们都是互相调和，而且的确是同一的——一种伟大、完整和合乎理想的统一。迈内克更多地是从诗人而非哲学家那里吸取了这套思想，尤其是从歌德那里吸取，而正是歌德赋予它依照其本性看来要求的艺术式表达。他的世界观受康德、席勒和费希特的著作显示的、残

留下来的自由唯心主义的影响小得多。这些著作在他看来这样那样地远离现实,而客观唯心主义者在他看来却探测了现实主义的本质。

然而,年轻时候的迈内克所以全心全意地信奉莱布尼茨式的哲学传统,不仅是靠它在歌德诗作中的表现,也是靠,甚至更多地是靠它在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著作中所占的支配地位,而迈内克一生始终自认为是兰克的忠实追随者及其未来的继承者。在其多卷法国史、英国史、德国史和教皇史论著中,兰克不得不讲述的并非令人愉快的史事:阴谋和下毒,屠杀和残暴,拷问和捆绑,暗杀和绞刑——所有这些在其中起了太突出的作用。然而,尽管兰克会对遇见的邪恶感到愤怒,尽管他从来不宽恕这邪恶,但他并不真正为之惊骇。他被人说成是不敏感,说成是心肠冷漠,以致对散播在人类整个现代道路上的种种邪恶不会做出有力的反应。情况也许是这样。不过,他在历史的一切残忍面前所以表现得那么冷静沉着,真正原因不在于他的性格,而在于他的哲学。他确信,只要我们往后退,使自己离历史图景有足够距离,我们就会看到即使是最阴暗的色彩在这图景中也有其正当的位置,看到它们只是促使较浅的色调显得更为亮丽。他在 1783 年给儿子写道:“万物的秩序由神安排,这安排我们的确无法直接证明,但我们可以感觉到。……相信天意乃一切信仰的概要和本质,对此我坚定不移。”在其《世界史》第三卷(1881 年)的导言中,他更冷静地写道:“从下面一点就可以看出一般人类历史的理想本质,那就是在各国各民族相反利益之间发生的斗争中,越来越崇高的力量脱颖而出。”显然,历史在他看来乃神意使然,就像弥漫着一种轻扬直上、活化万物的仙风,充满神的精神。

这种一般的万有在神论还出现在兰克关于政治生活的更为具体的理论观念中,例如由他 1836 年的《政治会话》表述的,而迈内克受此著作影响之深,甚至超过这位大师更为专门的历史著作。对兰克来说,国家乃神秘的生命本原的一种发散物,宇宙的一切可感知的现象正是从这本原中产生出来,而国家就是宇宙的一种个体化和具体化。它属于他称之为“真实理想”的那个领域,在其中我们看到理想被有形化,被赋予可感的形式,变为实体。国家就这样被解释为精神的凝结物。在其论文《历史和哲学》中,兰克表达了如下看法:“在权势中显露出一种精神存在”,而若考虑到所有先行命题,那么这不过是从根本的万有在神论前提出发得出的一项合乎逻辑的、自然的结论。确实,国家,尤其是现代权势政治国家(the modern power-political state)不能不对兰克及其追随者迈内克有非常特别的吸引力:难道它不是恰如客观精神本身,以本原的权能奋力前行,趋向愈益伟岸的自我弘扬和愈益充分的自我实现?就如人们能够看出的那样,兰克学派的基本哲学包含着权势国家(the power state)的神化,其来源可能是清白无害的,但其效果必定变得危险。像兰克那样将国家——犹如个人的灵魂——称作一种“神的观念”,或者像迈内克后来将做的那样,^①谈论其“伟大和道德尊严”,在课堂里或出版物上是无害的,然而这样的观念离演说家的讲坛甚或离战场究竟有多远?例如,倘若一个国家叫嚷要更大的“生存空间”,那么按照这种哲学,它难道不总是有理的吗?难道这叫嚣不是肯定会被解释成表达一种至关重要的需求,并且由于有关国家的活力是那与神性同一的、更广泛的活力

^① 《人道理想与民族国家》,1922 年版,第 279 页。

的一部分而成为正当吗？我们在此触及到对于下述问题的深层解释之一：这个拥有众多诗人和哲学家的国度如何，并且为何竟会变成一个街头暴徒和凶残流氓的国度？不幸，这一转变轻而易举，历史学家为其完成助了一臂之力。在光辉煌人的兰克身后，背景中隐约浮现出险恶的铁血宰相俾斯麦（且不说其他更险恶的人物），他在战争的熔炉中锻造了他的帝国。诚然，兰克认为将各民族联结在一起的纽带比使它们互相分离与不和的原因更有力，而且他希望它们的多样性和各自独特发展将最终导致“真正的和谐”。^①然而另一方面，他不打算对主权国家设置限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削减其自主性。每个国家都必须彻底贯彻它自身固有的生存原理，如果在此过程中它陷入同别国的冲突，那么战争的考验就必不可免。

寓于其世界观根源处的那种乐观主义，使得兰克及其思想追随者们甚至不可能将战争视为一种纯粹的、彻头彻尾的邪恶。战争，有如经验证明的那样，属于历史的常规事态；所有历史皆出于神启——在细节上或许不是这样，但在总的方向上是这样——因而甚至战争也必须以严格的一贯性被假定是善的：在“善”这个词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如此。这个学派的成员与其大师一起，由这么一连串思想指引，到头来便将战争视为一种道德力的较量，较量双方即使在最剧烈的拼搏中，也从真正像必然的那样彻底分离，而是仍旧由它们都属于其中的、更广泛的文化和精神共同体“笼罩”；而且，双方经过这较量，它们的人格得到更清楚的规定，它们的生命特性得到有力的强化。在谈到兰克 1833 年的论文《论列

^① 《论列强》一文结尾处。